



徐州博物馆

悠悠楚王地 彭城寻汉韵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江苏徐州，古称彭城，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西楚霸王项羽曾以彭城为都，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也在这里。公元前201年，刘邦废楚王韩信，封少弟刘交为楚王，于彭城建都。西汉时期，先后历十二代楚王，东汉时期，历一代楚王、五代彭城王。徐州地区分布着多座汉代诸侯王陵墓，这些王陵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收藏在徐州博物馆。

徐州博物馆由陈列楼、西汉采石场遗址、土山东汉王陵墓、清乾隆行宫四部分组成，基本陈列包括“古彭千秋”“大汉气象”“天工汉玉”“汉家烟火”“俑秀凝华”“金戈铁马”等，全面展示了徐州丰富璀璨的历史文化，尤以汉文化为鲜明特色。

金玉奇珍

徐州博物馆许多闻名遐迩的珍藏来自狮子山楚王墓，据研究，墓主人或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整个陵墓规模较大，包括狮子山、羊鬼山、绣球山3座山峰，除楚王和王后墓外，还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陪葬坑、陪葬墓、陵寝建筑遗址等。楚王的墓葬位于狮子山，虽然在古代已被盗掘，仍出土文物近2000件（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金缕玉衣。

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的殓尸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接而成，又名“玉柩”“玉匣”。已出土的玉衣资料显示，西汉诸侯王、列侯的玉衣多数是金缕，也有使用银缕、铜缕和丝缕者。东汉时期则表现出较为严格的等级差别，从考古发掘来看，东汉诸侯王、列侯没有使用金缕玉衣的，都是用银缕、铜缕或漆金铜缕，与《后汉书》中相关记载吻合。

狮子山楚王墓金缕玉衣出土时严重散乱，曾被盗墓者从棺室中拖至墓石上，抽走金丝。出土的玉衣片共有4000余片，玉质温润，表面经过打磨抛光；尺寸都较小，最大的不足9平方厘米，最小的还不到1平方厘米，有的厚度仅1毫米；形状



多样，有正方形、长方形、半月形、三角形等。2001年，徐州博物馆对金缕玉衣进行修复。修复后的玉衣由头罩、前胸、后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等十余部件组成，玉片总数4248片，穿缀玉片用的金丝重1576克。这件金缕玉衣是国内出土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精的玉衣。

除了玉衣，狮子山还出土了多种精美玉器，有玉戈、玉璧、玉佩、玉璜、玉卮、玉杯、玉带钩等，体现了汉代高超的制玉工艺。展柜里一件龙形玉佩颇为吸睛。它以和田玉雕琢而成，莹润光洁。龙身呈S形，张须露齿，双目圆睁，鬃毛向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纹饰，前肢曲折，龙尾上卷并平削，通体饰勾连纹。这件玉龙继承了战国玉龙的雕琢风格，与安徽长丰杨公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的玉龙风格非常接近，类似的玉龙还在广州南越王墓中有发现。这种S形玉龙多见于西汉早期王侯墓，这一时期的玉龙着重表现龙的力量和气势，不同于西汉中期以后突出表现龙的温顺、静谧的艺术风格。

金带扣也是徐州博物馆颇负盛名的珍品。楚王墓外墓道西侧出土了两条形式相同的金扣嵌玉腰带，腰带两端为纯金带扣，中间为丝带编缀3排海贝组成的带体，海贝中夹缀了数朵金片制成的



图4：西汉S形玉龙。



花饰。两副带扣厚度和重量不同，尺寸和纹饰基本相同。眼前这副金带扣由两块长方形金带板和一枚金扣舌组成。带板正面浅浮雕猛兽咬斗图，动物形象雄健有力，周边为勾喙鸟鸟纹。四周凸起边框，中部有两个横向双环钮，每块带板内下角各有一个略近三角形的小孔，以便扣舌穿入。扣舌形状似鸟舌，后部有穿孔。

金扣腰带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常用的带具，由于其华贵精美，为汉代贵族所推崇。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金带扣是目前所见汉代最华美、系结方式最先进的带扣，虽然纹饰主题是草原猛兽搏斗，但从铸造工艺、系结方式来看，应为中原制品。



高约16米、底部直径近百米的圆形封土。记者在现场看到，二号墓采用室内揭盖式发掘，自上而下把墓室上面的土石逐层清理掉，直至揭露到墓室底部。

据史籍记载，元代贾胡曾在土山上建一草庐，用20年时间盗掘此墓。徐州博物馆考古部主任耿建军告诉记者，考古发掘所见与史料记载的盗墓情况基本相符，盗洞位于墓葬封土的西北角，洞中清理出玉衣残片、漆木器、铜器等，墓室中的陪葬品也被移走。

土山二号墓封土内发现封泥4500余枚，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还有私印封泥及无印封

陶俑百态

汉代非常流行陪葬陶俑，徐州出土汉代陶俑6000件以上，是两汉时期除都城长安以外发现陶俑数量最多的地区。徐州博物馆藏有大量汉代陶俑，其中不乏国内少见的精品，它们种类丰富，形态活泼，反映了当时的宫廷生活。

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彩绘执兵陶俑151件，色彩明艳，服饰细节生动，极大地丰富了汉代早期服饰资料。展柜里陈列着4件戴帽执兵陶俑，头戴紫色帽，身穿二重右衽曲裾深衣和肥袴，面部细长目，留有不同样式的八字胡，神态各异。胸前佩长剑或环手刀，腰间束带并悬挂挂带和绶带，双手半握拳执兵器。部分俑的绶带所系长方形物上有“郎中”二字。郎中即郎中，指宫廷之郎，据此推断，这批彩绘俑应是楚王的宿卫侍从。

另一组彩绘背箭筒陶俑也来自北洞山楚王墓。此类俑共出土64件，均戴帽，身佩长剑，背负箭筒。箭筒通过腋下和左肩的三根带子固定，系于胸前，便于背负和奔跑。陶俑双手半握拳于腰两侧，左手略高于右手，掌心向下，作持物状，可能是双手持弓。一些陶俑右臂绶带上亦有墨书“郎中”或“中郎”字样。

身姿曼妙，长袖飞舞，展厅中一组驮篮山楚王墓出土的彩绘舞俑令人驻足。曲裾陶舞俑身着右衽曳地长袍，上体前倾，左臂自然垂于体侧，右臂高高上举，长长的衣袖如瀑布般垂落。绕襟陶舞俑面容清秀，身体随着舞步变化呈现出S形，双臂上举，左右上臂前后各刻有一个“五”字，衣袖从空中甩向身后，动感十足。从造型上看，舞俑跳的应是当时盛行的长袖折腰楚舞。北洞山楚王墓也出土了20件类似的舞俑，手臂弯折处也刻有“五”字，笔画内填红彩。这样的绕襟陶舞俑在其他地区未见出土，是了解西汉早期舞蹈样式的重要实物资料。除了翩跹动人的舞俑，还有抚瑟俑、击磬俑、吹奏俑等神态逼真的乐俑，再现了楚王宫中鸾歌凤舞的景象。

土山探秘

徐州博物馆北侧有一座土山，包含3座东汉墓葬。其中一号墓规模较小，三号墓可能为废弃墓。二号墓从1977年发现到2020年发掘完成，历时40余年，被评为“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土山二号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墓主人应为东汉楚王或彭城王，具体身份仍有争议。墓上有

泥。数量巨大的西汉封泥从何而来，又为何出现在东汉王陵中？耿建军推测，或许是楚宫废弃物堆积在泥土中，后被挖来作为王陵封土。

墓室由耳室、甬道、前室、后室、回廊构成，按照功能区分放置不同的陪葬品，共出土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文物350余件。后室为棺室，中间为石砌棺床，东西并列两具漆木套棺，同时还出土银缕玉衣和漆金铜缕玉衣残片，结合人骨鉴定的结果，可确定为夫妻合葬。东回廊内葬一人，使用单层梓木漆棺。考古队员在棺内发现一簇形如莲子、大小均匀的蓝绿色椭圆琉璃珠，大约76枚，后确认为早期的围棋。前室放置2件四足石案，其中一件石案上覆盖绢类织物，上有纵横各17道墨线，同时还发现了88枚椭圆形黄铜珠，应为围棋盘和围棋子。黄铜棋子与琉璃棋子形制大小相同，印证了汉代对弈双方是以棋子的质地和颜色来区分。

“未来这里将建成考古博物馆，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考古发掘现场，还会加入一些与考古相关的公共教育课程。”徐州博物馆馆长李晓军告诉记者，“今年，徐州博物馆将对一些展厅进行升级改造，提升文物保护水平和参观体验。此外，还将在2020年成立‘淮海经济区博物馆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苏鲁豫皖4省10市博物馆协同发展，推出一批学术与科研成果。”



图1：西汉绕襟陶舞俑。
图2：西汉“刘注”银印。
图3：西汉金带扣。
图4：西汉S形玉龙。
图5：土山二号墓出土的东汉琉璃棋子。
徐州博物馆供图



巨野博物馆藏元代金饰品。

巨野博物馆供图

巨野访古：

黄河故道下的十字莲花

康建国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山东省菏泽市位于黄泛区核心地带，千百年来留下了许多与黄河有关的故事。不久前，笔者来到菏泽市巨野县，开展黄河文化相关调研。

巨野古称钜野，因大野泽而得名。大野泽是黄河下游南岸最大的湖泊，这一带是出河入海的交通要地。巨野县位于大野泽旁边一片低山残丘地区。在黄河经常泛滥的平原，这里是一处绝佳的相对高地。巨野因黄河而兴，史前巨野地区文化发达，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都有发现。先民择高而居，留下了很多古堍堆遗址。周代巨野为鲁国封地，相传《左传》记载的鲁国国君捕获麒麟的地方就在这里。

巨野历史上多次被洪水淹没。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决口，流经巨野，由泗水入淮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抵御金兵南下，人为决开河堤，黄河由泗水和济水注入黄海，巨野再次被水毁。元代重修巨野城，济宁路总管府设在巨野，辖兖、济、单三州，巨野进入新的鼎盛时期。元代末年和明洪武年间，洪水再次淹没巨野，直至洪武九年（1376年）洪水消退，县治才得以重新迁入巨野。

洪水冲毁了大部分历史遗迹，而在巨野地下却掩埋着大量文物。近年来，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让巨野博物馆这座2018年才建成的县级国家二级博物馆行列。巨野博物馆收藏文物、自然标本1.3万余件（套），从史前到近代，时代序列较为完整。特色精品文物以汉、宋、元时期为主，有精美的玉器、青铜器、金银器、瓷器和众多珍贵的碑刻、石雕等，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4件。

在巨野博物馆精品展厅，一组元代金饰品引起了我们的兴趣。2007年巨野县北关党校教学楼建设施工时，在距地表3米深的地方发现了石碑。考古人员在挖掘石碑的过程中，又发现了石像生、石供桌和两座古墓。一座东西朝向，一座南北朝向，共同位于主墓道一侧，是异坟异葬的夫妻墓。墓碑上有能辨识的蒙古人名和元世祖至元年号等，结合墓室和石像生位置来判断，此处应为元代贵族家族墓地。墓地曾多次遭洪水侵袭，泡水严重。在其中一座东西朝向的墓室内，考古人员从淤泥中发掘出这组金饰品。除金簪、金戒指、金耳环等常见物品外，一件嵌宝石掐丝金饰品和一对金十字架极为特殊。

十字架由金箔制成，表面篆刻缠枝纹，周边缀以串珠纹，四个顶端为三角形，均有小孔，方便缝缀在衣帽上。这种造型的十字架，属于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标志。聂斯脱里教起源于叙利亚，是一个典型的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的西方宗教，大约在7-10世纪传入中国，在唐代被称为景教，元代称景教徒为也里可温。景教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大量中华文化元素，儒释道思想都有体现，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了促进作用。景教十字架标志与传统基督教十字架有所区别，十字的四个顶端或有向内的三角缺口，或为向外突出的三角形，或缀有花枝。最重要的一点是，景教十字架一般与中国传统莲花图案组合在一起，称为“十字莲花”。元代时景教在内蒙古和福建泉州地区流传较广，山东地区虽有景教信仰的记载，但此前并未发现文物。巨野博物馆的金十字架，是山东境内首次出土的与景教文化有关的文物。

与十字架一起出土的嵌宝石掐丝金饰品，造型较为罕见，整体近似心形，有夹层，采用锤鍍、镂雕、掐丝、焊接等多种工艺制成。正面有宝石嵌孔，宝石大部分脱落，仅存叶片形绿松石。背面有钮，可以缝缀在衣帽上。结合出土背景来看，这件金饰品可能是象征十字莲花的宗教文化饰品，造型以十字为骨架，下以中国传统莲花纹相衬。它的样式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嵌宝石掐丝金饰品有相似之处，类似的纹样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发现的景教墓顶石上也可看到，是一件体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

该墓出土的墓碑上刻有“表庆之碑”字样。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撰的《钜野县志》中，抄录了“表庆之碑”和该家族墓地的其他碑文共4篇，可见在乾隆年间就发现了这个家族墓地，当时尚存多块墓碑。根据现存墓碑和县志抄录的碑文内容，可以判断此处墓地属于济宁路“达鲁花赤”（元代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名称）按檀不花家族。碑文记载按檀不花次子驷马是景教掌教司官，曾重修也里可温寺庙，因此该家族墓地中有景教文化的随葬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碑文记述，按檀不花的祖父岳雄（或岳难）是阿里马里（今新疆霍城县）人。岳雄早年追随成吉思汗，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将军，元代被赐封在松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定居，死后也葬在松州。巧合的是，在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也曾出土与景教有关的墓碑。碑身上画景教十字架，下有莲花图案。十字架上部左右两侧为叙利亚文，下部为回鹘文。根据回鹘文记载可知，这座墓葬属于一个叫药难（音译）的将军。从活动时间、身份地位以及宗教信仰来看，药难和岳雄很可能为同一人。一个生活在西域的色目贵族，带着景教信仰，跟随成吉思汗进入蒙古草原，其家族后代又来到黄河岸边做官，积极学习儒家文化，融入当地生活——按檀不花家族的故事，充满多元文化和传奇色彩，这也正是黄河文化兼容并蓄、开放多元的生动写照。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研究员）